

书斋里的追问

——关于田野作业中真实性的思考

陈星如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就是真实性, 调查结果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是否反映了当地社区的原始生活, 这直接影响到民俗研究的可靠性。因此对田野作业的真实性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在现代田野作业实践中, 依旧有许多因素或隐或显地干扰着这一特性, 如调查者本身的经验惯性, 受访者的参与程度, 再如研究方法等, 稍有不慎便会使得田野作业结果陷入真实性存疑的境地。因此本文试图探究田野作业中影响真实性的因素, 并就如何做到真实性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田野调查; 研究方法; 真实性

一、影响田野作业真实性的因素探究

田野是变化中的田野, 社会背景乃至人们的心理背景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变化。哲学上讲, 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只能无限接近真理却始终无法获得永恒的真理, 这就是因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世界, 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一时一地的真实, 而非永久的真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探究田野作业的真实性问题会比较容易理解。既然田野作业的真实性问题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具体的田野作业实践中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一性质。

(一) 调查者的个人经验以及传统的学术范式

大体上讲, 田野研究分为问题研究与过程研究两大类。问题研究是指基于某一特定的问题进行的田野调查, 调查过程直接为这一问题服务, 这样的调查方式针对性强、耗时短、出成果快。后者则是在某社区进行长期调研, 这种研究方式耗时长, 调查范围广, 内容也相对繁杂, 但是调查结果更具客观性更接近于社区原本的面貌。问题研究与过程研究各有优劣, 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时间, 目前的田野工作者因为时间的问题大多会选择问题研究的调查方式, 他们只是以一个调查者的身份进入田园, 而不是参与者, 他们大多数人在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后便会离开, 这样做的确会节省很多时间, 且问题

导向带来的极强针对性也很容易出成果, 但这样的成果其真实性还有待探究。

其一, 调查者往往会主观上用自身经验填补对当地生活缺乏了解的空缺, 对不能理解的地方, 想当然地用自身生活经验理解, 这种做法一点也不土著, 调查者与受访者的关系更像是从一开始就设定好的问题征询意见, 而不是以受访者为主导, 得出来的结果其真实性自然就有待考究。

其二, 现目前的民俗志创作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学术范式与学术话语体系, 田野工作者们尤其是第一次进行田野调查的人会在不经意间受到这套学术范式的影响, 进而影响研究过程的客观性, 同时也束缚了在真实的田野环境中那些“意外的”“不经意的”“生动活跃”的因素, 这点显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田野调查是在活的田野环境中发生的, 这不同于历史学家面对书籍文献做研究, 鲜活生动应该成为田野工作者们追求的目标, 努力发掘出更多的可能。

(二) 访谈方式的选择

田野作业中, 调查者与受访者访谈方式的进行在具体实践中大致可分为“引导式”与“互动式”两种, 顾名思义, “引导式”即调查者占据主导地位, 进行单方面的思想灌输, 引导着受访者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 这种单边主义的霸权交流在

田野调查中是极大的弊病，需要努力克服，田野工作者们应该重视当地人的声音，让当地人说话，建立双向互动的良性交流机制。

在进行田野调查前，调查者们通常会就所要调查的问题列一个提纲，包括调查范围、调查计划、调查内容等。提纲的出现一方面让田野调查更具条理与逻辑，方便调查的顺利开展，但是另一方面，提纲的出现也是让田野调查真实性存疑的原因之一。首先，田野是一个整体，田园生活也是一个整体，这是不能人为进行分割的。而提纲所划定的调查范围恰恰就对田野进行了人为分割，使得田野成为了部分田野，而无法进行总体地考量。田野在变，人也在迁徙，当时当地的情况不能代表整片区域的情况，况且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不只局限于一个小的范围，如果在调查时只着眼于划定的那一部分区域，那么得到的答案也只是暂时的真实，不完整的真实，时效性会很低。其次，提纲式的访问可以理解为一问一答式的访问，这样一来，受访者就会根据调查者的提问对自己已知的信息进行筛选，作出符合调查者期望的回答，这样得到的信息是人为裁剪过的信息，相较于互动地探讨，受访者能说出来的信息，愿意说出来的信息及其有限，是被提纲框住的答案，其真实性自然不言而喻。田野工作者们应该做的是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发现问题，提取信息，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提取信息而去与当地人交流。

（三）调查者的身份意识

上文已经提到过田野调查的时间问题，有限的时间使得调查者很难做到参与调查，去切身地体会当地的生活，因此为了调查而来，调查完就走是田野工作者的常态。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调查者们往往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意识进行田野调查，局外人所带来的陌生感、疏离感使得调查者与受访者之间难以建立足够的信任，也就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其次局外人的身份意识也限制了调查者自身的发挥，对当地文化缺乏认同感，调查变成了完成任务，这样写出来的成果到底是对原始社区的反映还是调查者既定观念的外化，值得深思。

再一个就是“文化震惊”的问题，无疑，调查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文化水平差异是现实存在的，一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面是可能文化程度较低的当地土著居民，当这样两种群体初次碰面时，便会因为语言模式、生活习惯、价值观的不同而造成心理以及精神上的冲击。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读书与知识的社会，重知识的理念经多代的传承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故而，当地人不由自主地就会对与自身文化差异悬殊的人产生尊敬、崇拜乃至恐惧的情绪。这已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如果这时候，田野工作者们身份意识不清晰，自视甚高把这本就在心理上不平等的关系再度倾斜，受访者们内心的不确定和恐惧感只会更甚，这样一来调查者们所获取的信息也就不尽真实了。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讲求要建立一种调查者与受访者互惠共赢的利益关系，调查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信息，那么，受访者呢？他们是否也应该从田野调查中有所收益？俗话说“熟能生巧”，或许第一次接受采访时还青涩懵懂不知所云，第二次，第三次，多次之后渐渐地就有了一套固定的回答体系，甚至尽可能地美化答案。这样得来的调查结果，其真实性可想而知。多次多人的调查还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受访者的回答不“土著”了。第一次与受访者交流的人所得到的反馈信息是最原真的回答，但交流是双向的，调查者从受访者处得到了信息，受访者也能从调查者处获取一定的信息，那种他们认为是“更专业”的信息，以至于往后再接受调查时，受访者的回答会不由自主地带上前调查者的思想色彩，所以得到的答案也就不原汁原味了。

（四）文化差异的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调查者与受访者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是不相同的，即使是本地人回乡调查，也会因事物的变迁而感到陌生。除了受访者与调查者之间的语言差异导致交流困难外，文化的差异使得调查双方的交流遇到一定的阻碍，不了解的人就会很难理解，掌握着撰写权的调查者如果对当地文化理解不了，那么写出来的作品怎么称



得上民俗志呢？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与文化背景影响着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与思考的方式，诚然，无法要求每一位调查者对当地民俗文化感同身受，但至少应该要尊重文化差异，这样做出来的成果才能更加客观真实。

（五）现代传媒技术对调查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田野研究的调查手段也变得更加科技、便捷。运用的数字传媒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存档，有利于对文化遗产进行长期有效地保护，对于无形的、口耳相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也能运用高清数码设备对其进行记录、保存、展示。但是，在摄像机前应要求做出来的行为与在特定文化氛围中作出的行为真的是一样的吗？行为确实是一样的，但缺失的是一种文化氛围。冷冰冰的数码仪器可以记录舞蹈的动作，可以记录手工艺制作过程，但没有文化氛围的衬托，观众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这其实是一个外在真实与内在真实的问题，现代传媒技术可以记录外在的真实，却无法反应内在的真实，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对于如何做到真实性的一些思考

真实性是田野研究一直以来极为重视的特性，那么真实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民俗学”重点我认为应该在“民”字上，即反映真实的人民生活，这才是真实性最本质的体现。人民的生活自然要由人民自己来说，调查者充当的是记录者的角色，切忌越俎代庖。

回到刚才提到的问题，现目前的田野调查中，多是由调查者主导的，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受访者由本应该是主导的地位下落为被动的地位，被动地接受着调查者的询问，陷入无意识的学术失语状态，这是田野作业中的困难。这样的问题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来调查者的身份意识不明确，主观地霸占了主导地位；二来，受访者缺乏主人翁意识，学术意识不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要求田野工作者们在往后的田野实践中帮助当地人构建学术身份，积极引导当地文化精英参与到民俗志的创作之中，让他们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还他们田野主体的身份。建构平等对话交流机制，让交流不再是一问一答，让受访者不再是被动地

依附于调查者，而是要主动地参与到调查中，甚至是参与到民俗志的创作中。当然，由于受访者的文化水平有限，学术意识也不够，这里讲的参与与创作不是让当地人完全自己创作，而是指调查者与受访者共同交流探讨，共同参与到研究之中，受访者给出原生的信息，调查者运用专业性的知识对其进行解读，转述，双方通力配合作出成果。

“民俗学”中的“民”不仅仅是写人民的故事，更是让人民自己写自己的故事。

从田野关系来看，董晓萍提出了四种田野关系，即拟亲属关系、熟人关系、官方关系以及文化翻译关系，^①在这四种关系中，拟亲属关系是最亲密的，也是最易建立信任的一种关系，却实属少见。田野工作者们应努力发展熟人关系，并利用熟人的社会关系网拓宽交际人群，与当地人建立互相信任的人际关系，这样受访者才会说、愿意说，给出的信息才更真实可靠，利于调查的顺利推进。熟人关系的发展，信任的建立需要调查者们的努力，作为外来“入侵”人员，自觉地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并给予足够的尊重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要把天平放平，平等地与当地人交流，降低“文化震惊”所带来的陌生感与疏离感，这是建立互信的关键一步。

无论是问题研究还是过程研究都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对于问题研究而言，提纲式的访问，针对性的调查所获得的结果只是对于一时一地的情况的初步认识，要想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还得进行多次造访。而过程研究存在的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内容繁杂等问题也需要多次调查逐步修正，以获得正确的认识。调查不是一次性的，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田野也不例外，因此，这两种调查方式都要求调查者们在进行第一次田野工作后要多次返回当地再次收集信息，以获得对于该问题的全面的认识，保证田野调查的真实性。

最后从调查者们自身角度来说，调查者应做到足够客观，在研究时尽力摆脱自身经验的束缚，学会从当地人的角度看问题，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思维碰撞是及其

明显的，稍有不慎就会调入思维的陷阱，不仅理解不了当地民俗，更有甚者还会对自身产生怀疑，这就得不偿失了。除了保持客观以外，田野工作者们还应摆脱“局外人”这种意识。田野调查不是简单的提问回答那么简单，很多民俗的意义我们都已经成了通识性的知识，比如双手拿东西表示尊重，我们调查的意义不在于把这些大家都已经知晓的意义披上调查的外衣再拿出来讲一遍，以显得更有说服力，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调查的意义在于关注这类民俗行为所表示的意义，这是在具体关系中显示出来的，关系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我们讲，民俗学是一门活的学问。活的学问不需要局外人式的调查者，而需要真正融入其中、切身感受民俗文化的活的调查者。

田野调查是一种研究手段，它始终是要为研究目的服务的，民俗学的研究目的就是研究人，研究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落脚点应该始终在人身上。在具体的田野作业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影响调查结果真实性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应该落脚到人身上，无论是建立互信平等的田野关系，还是构建调查者与受访者的对话机制，这都要求田野关系双方都作出改变，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保证田野调查的真实性。

注释：

①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8,第237页.

参考文献：

- [1] 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2]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02).
- [3] 董晓萍.田野关系是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工具[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5).
- [4] 普·巴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田野关系三个维度之分析[J].民俗研究,2009(03).
- [5] 万建中.让当地人说话[J].民族艺术,2018(05).